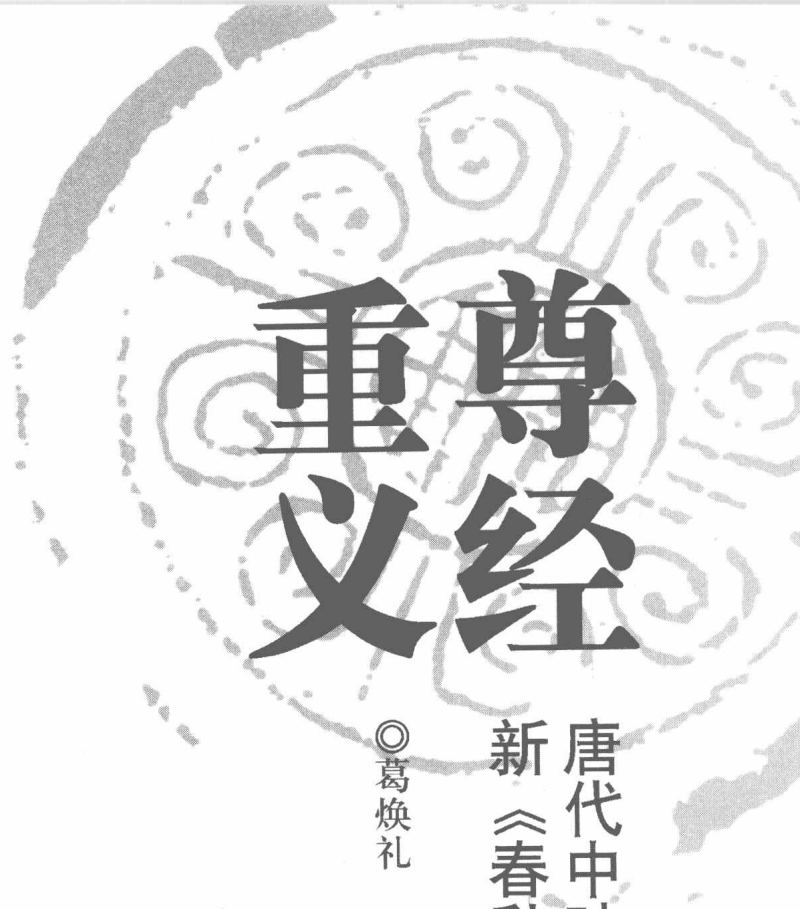


200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2009年度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成长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重尊 义经

◎葛焕礼 著

唐代中叶至北宋末年的
新《春秋》学



尊经 重义

唐代中叶至北宋末年的
新《春秋》学

◎葛焕礼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尊经重义:唐代中叶至北宋末年的新《春秋》学/葛焕礼著. —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7-5607-4586-2

I. ①尊…

II. ①葛…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春秋时代

IV. ①K22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01579 号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0 号 邮政编码:250100)

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省英华印刷厂印刷

720×1000 毫米 1/16 24.5 印张 449 千字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50.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序 一

新年伊始，承山东大学友人葛焕礼同志盛谊，远道来访，示以论究唐宋新《春秋》学之大著稿。欣悉近期书稿修订葺事，即望送请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遵焕礼同志嘱，谨赘数语奉附骥尾，以志祝贺。

在中国学术史上，《春秋》既是开风气的史书，更是影响深远的儒家经典。孔子有云：“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亦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惟其如此，迨于清亡，历代经师董理群经，除《周易》之外，用力最多者，即为《春秋》。战国秦汉间，左氏、公羊、穀梁三家解《春秋》，各抒己见，殊途同归，遂成其后三传附经并行之格局。唐中叶以降，舍传求经之风起，啖助、赵匡、陆淳三家递相祖述，开推本经义、以新意解《春秋》之先路。迨于北宋，诸儒后先相继，新说迭出，乃俨成一派而有学术史家新《春秋》学之谓。

近二三十年间，随着学术史研究的深入，《春秋》研究，尤其是新《春秋》学之探讨，遂渐进入学者视野。历有年所，开拓日深，喜呈方兴未艾之气象。焕礼同志见贤思齐，勇于求新，自2000年起，即追随诸位先进，潜心于唐宋《春秋》学之梳理。十余年间，先从啖助、赵匡、陆淳三家起步，继而再逐一究心孙复、刘敞、孙觉、程颐、苏辙、崔子方诸家，爬梳文献，用力极勤，一丝不苟，寒暑迭易，历时十载而成此自为一



体的唐宋新《春秋》学论著。

焕礼同志之所致力，乃中国古代学术演进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涉及面广，难度极大。如今既已登堂入室，卓然有得，深信矢志以往，精进不已，必将作出更多更大之贡献。祖武不学，于《春秋》更是一知半解，惟有以此一良好之祝愿与焕礼同志共勉。

陈祖武 谨识

2012年春节于京东潘家园

序 二

唐宋时期的新经学,是对传统汉学革新的产物,也是后世宋学的起始——它奠定了此后直至清代前期儒家经学的基本理路和风格,在中国学术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近代以来,传统古典学术研究沿依了清乾嘉以降推尊汉学的路向,对宋学中的经学内容多不甚措意,而宋学的研究也多聚焦于探究心性义理之学的理学。这种学术研究的倾向性,使得作为宋学思想根基的经学在很大程度上遭到“遗略”。正因为此,我们对于当时儒家知识、思想世界的真实存在、演变状况的认知,尚有诸多模糊之处,远不敢说已探明其究竟。

焕礼此书,无疑对这一待解之题作出了部分但又深入的解答:选取具有典型和关键意义的中唐逮北宋的新《春秋》学为研究对象,在综论其历史渊源、演变状况和脉络关系的基础上,重点论析此时期内最具代表性的新《春秋》学家的学说思想。藉此一角,为我们透露出一个更为丰盈沉实的宋学世界,这是令人欣慰的。

综观全书,作者不仅对上述宋学“遗略”问题体现出一种学术的责任和自觉,而且在经学价值评价、经学研究的方法论等问题上,也都体现出一种回应学术研究的自觉意识。对于前者,作者认为“探讨经学的社会属性及其历史价值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应该将经学回归历



史,在具体历史环境中作出定性认识和价值评判”。对于后者,作者认识到现今通行的章节表述体“所具有的分析、归纳的特点和表述能力”与被研究者思想学说的整体性、系统性间,必定会存在矛盾,认为解决此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建立起一个合理的论述框架”。我想,这些问题的提出,对于当前的经学研究来说,应该是具有某种启迪和引导意义的。

严格、精细的历史学时空观念和分析方法,应该是这本“经学思想史”著作的一个最大特点。如个案研究中,首先探讨学者生平、师承及著述成书、版本与流传年代等,使文本的讨论被严格放到准确的时空语境中。而该书在讨论学者生平、著述等情况时,又特别重视史源学的梳理,使讨论对象的本初面貌“尽量原始呈现”。如对新《春秋》学家看似简单的生平介绍,作者即已尽量避免使用非第一手文献,如元人所修《宋史》,体现出严格的年代学标准与严谨扎实的取向。由于这种史源学方法的运用,长久以来有关这些学者生平、著述的一些未发之覆,因此而得到凸显。这种研究,自然是对《春秋》学史实背景的一种更真实、更客观,因而也就更合理、甚至更生动的建构,也就有可能形成对研究对象的著述、师承、学说及思想体系的更深层次的认知。

作者对文本的研读是下过苦功的。对于所要讨论的每一位新《春秋》学家的相关著作文本,都做到了彻底通读,在此过程中,几乎将全文按条目分类摘抄,形成繁细的资料分类汇编;再凭借其逻辑组织能力,论述成篇。“徐徐下手,久久见功”,使得这本下过苦功的著作有一种沉静、从容的学术自信。这既体现在对《四库全书总目》、《宋元学案》甚至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古人说法的“规正”上,也体现在若干对时下学者论说的“质证”上。当然,由于所涉问题繁杂,作者错讹之处必所难免,亦希望方家学彦予以批评。如此,方可共同推进该领

域研究之进步。

焕礼此书是由其博士学位论文补充、修改而成的。从本科到博士，他都是在山东大学历史系学习的。山东大学素以“文史见长”，学风笃实质朴，这对每一位学生都是有影响的。由于学术旨趣相近，因此焕礼在读本科时，就跟从我写过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本科毕业后去外地工作了两年，又考回来从我读研究生，一直到博士毕业。近五六年来，他受陈祖武先生、姜生教授的影响较大，学术进益颇为明显。几年前，又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学一年，学术视野亦得开阔。具备这样的学术基础，焕礼若能一如既往，沉潜精进，当会取得更为厚重的学术成果。

是为序。

王育济 谨记
2012年1月8日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唐宋新《春秋》学的渊源	(20)
第一节 两汉《春秋》三传学融通考	(20)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春秋》三传学融通考	(33)
第三节 关于汉魏六朝《春秋》三传学融通与新《春秋》学发源的认识	(38)
第四节 唐宋新《春秋》学的兴发原因	(48)
小 结	(53)
第二章 唐代中叶至北宋末年《春秋》学的演变概况	(54)
第一节 唐代后期的《春秋》学	(54)
第二节 五代时期的《春秋》学	(63)
第三节 北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的《春秋》学	(64)
第四节 北宋仁宗、英宗二朝的《春秋》学	(66)
第五节 北宋神宗、哲宗、徽宗三朝的《春秋》学	(77)
小 结	(85)
第三章 啖助、赵匡和陆淳的《春秋》学	(87)
第一节 啖助、赵匡和陆淳的生平及三人交谊	(87)
第二节 啖助、赵匡和陆淳对《春秋》学基本问题的认识	(94)
第三节 啖助、赵匡和陆淳《春秋》学的特点和思想	(108)
小 结	(120)



第四章 孙复的《春秋》学	(122)
第一节 孙复的生平和著述	(122)
第二节 孙复对《春秋》性质及其所寓微旨的认识	(129)
第三节 孙复《春秋》学说的内在结构及尊王攘夷之义	(135)
第四节 孙复《春秋》学的特点和思想	(144)
小 结	(153)
第五章 刘敞的《春秋》学	(154)
第一节 刘敞的生平、学术渊源及著述	(154)
第二节 刘敞对《春秋》性质、宗旨的认识	(162)
第三节 刘敞《春秋》学的特点和思想	(167)
第四节 刘敞的学术地位问题	(182)
小 结	(192)
第六章 孙觉的《春秋》学	(194)
第一节 孙觉的生平、著述及学术师承	(194)
第二节 孙觉对《春秋》性质、宗旨的认识	(204)
第三节 孙觉《春秋》学的特点和思想	(209)
小 结	(222)
第七章 程颐的《春秋》学	(224)
第一节 程颐的生平、《春秋》学著述和师承	(224)
第二节 程颐对《春秋》性质、宗旨的认识	(232)
第三节 程颐的《春秋》解读方法	(238)
第四节 程颐《春秋》学说的特点和思想	(249)
小 结	(263)
第八章 苏辙的《春秋》学	(265)
第一节 苏辙的生平、《春秋》学著述和师承	(265)
第二节 苏辙对《春秋》经传的认识及其解说方式	(270)
第三节 苏辙《春秋》学的特点和思想	(277)
小 结	(284)

第九章 崔子方的《春秋》学	(296)
第一节 崔子方事迹、著述考	(296)
第二节 崔子方对《春秋》性质、宗旨的认识	(300)
第三节 尊经排传及经文解读方法.....	(312)
第四节 崔子方《春秋》学的思想特点.....	(314)
小 结.....	(318)
第十章 汉、宋《春秋》学的异同	(319)
第一节 汉、宋《春秋》学著述形式比较	(320)
第二节 汉、宋《春秋》学著述专题比较	(324)
第三节 汉、宋《春秋》学经传关系比较	(327)
第四节 汉、宋《春秋》学三传关系比较	(331)
第五节 汉、宋《春秋》学理论学说比较	(338)
小 结.....	(344)
结 语	(347)
参 考 文 献	(361)
后 记	(375)

绪 论

本书所谓的“新《春秋》学”，是指由中唐啖助、赵匡和陆淳等人兴起的一个新的《春秋》学流派，它因应着唐代中叶以后中国社会历史的演变状况，深远流传，成为宋、元、明等朝《春秋》学的主流。与传统《春秋》学相比，新《春秋》学有着独具特色的为学方法和学说旨趣，甚至被视为“似乎是继《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之后陆续涌现出的第四种春秋传”。

自宋代起，就屡有学者指出这一流派的学风相较于传统《春秋》学的独特之处^①，但迟至晚近一直未能在名称上予以界定。就笔者所见，虽然日本学者稻叶一郎在发表于1970年的论文^②中，就称中唐啖助、赵匡和陆淳等的《春秋》解说为“新的《春秋》经解”，但最早明确以“新《春秋》学”指称啖、赵、陆及宋代新兴的《春秋》学的，当属吉原文昭在1976年发表的《北宋〈春秋〉学的侧面——以唐代〈春秋〉三子之辨箴义的继承和批判为中心》^③一文。此后葛兆光在1981年发表

① 如南宋晁公武云：“大抵啖、赵以前学者，皆专门名家，苟有不通，宁言《经》误，其失也固陋。啖、赵以后学者，喜援《经》击《传》，其或未明，则凭私臆决，其失也穿凿。”（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09页）清四库馆臣云：“说经家之有门户，自《春秋》三传始，然迄能并立于世。其间诸儒之论，中唐以前则《左氏》胜，啖助、赵匡以逮北宋则《公羊》、《穀梁》胜。孙复、刘敞之流，名为弃传从经，所弃者特《左氏》事迹、《公羊》《穀梁》月日例耳。其推阐讥贬，少可多否，实阴本《公羊》《穀梁》法，犹诛邓析用竹刑也。”（《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六“《春秋》类”小序，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10页）清末皮锡瑞云：“（陆）淳本啖助、赵匡之说，杂采三传，以意去取，合为一书，变专门为通学，是《春秋》经学一大变。宋儒治《春秋》者，皆此一派。”（皮锡瑞：《经学通论》（四），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59页）周予同先生认为，此派《春秋》学“不守家法，不顾学统，而为超今古文学、超三传之《春秋》研究”。（周予同：《朱熹》，见朱维铮编校《周予同经学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8页）晁氏、馆臣和皮氏所谓的啖助、赵匡以后的《春秋》学，即“新《春秋》学”。凡此诸说，足见史上已有不少学者对此派《春秋》学与传统《春秋》学的差异作出识判。

② [日]稻叶一郎：《中唐新儒学运动的一种考察——刘知几的经书批判和啖、赵、陆氏的〈春秋〉学》，见《中国中世史研究》，东京：东海大学出版会1970年版；译文载《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11卷第2期；又收入林庆彰、蒋秋华主编《啖助新春秋学派研究论集》，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印行，2002年，第305～338页。

③ 见《中国哲学史的展望与摸索》，东京：创文社1976年版，第633～653页；见林庆彰、蒋秋华主编《啖助新春秋学派研究论集》，第587～615页。



的《杜佑与中唐史学》(载《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1期)、户崎哲彦在1985年发表的《柳宗元的明道文学——其与陆淳〈春秋〉学之关系》^①等文,亦称啖、赵、陆的《春秋》学为“新《春秋》学”。户崎氏随后发表的《关于中唐的新〈春秋〉学派——以其家系、著作、弟子为中心》^②、《关于中唐新〈春秋〉学——以其创始者啖助的学说为中心》^③两文,更是径将“新《春秋》学”列入标题。孙昌武在出版于1986年的《韩愈散文艺术论》(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一书中,也以“新《春秋》学”指称啖、赵、陆的《春秋》学。从此以后,中、日学术界多以“新《春秋》学”概称此《春秋》学流派。

另外,也有些学者沿袭“汉学”、“宋学”的概念划分及其意涵设定,用“《春秋》宋学”概念指称这一学术流派,如宋鼎宗《春秋宋学发微》(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增订再版)、王天顺《宋代史学的政治功利主义与春秋宋学》(载《学术月刊》2008年第11期)等。笔者认为,自中晚唐至清代前期,《春秋》学领域内除却这一蔚为大宗的杂糅三传、重说经义的流派外,还包括一直保持着相当势力的《春秋左传》学。从学术存在形态的角度来看,“《春秋》宋学”概念也应当包含后者,因此,该名称的内涵和外延便都有着含混之嫌。而从学术界的习惯运用来看,“新《春秋》学”这一概念不仅有着足够的含容性,而且有着较为明晰的外延限定,能够恰当体现出它与传统的《春秋》学及同时的《春秋左传》学的不同,故本书因用之,作为此《春秋》学流派的概称。

对于这样一个流传久远、特色鲜明的学术流派,此前学术界一直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本书选取其形成、发展的重要时期——唐代中叶至北宋末年为研究时段,运用综合论述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在理清新《春秋》学的源头、唐代中叶至北宋末年《春秋》学的演变状况和脉络关系的基础上,重点论析了此时期内最具代表性的新《春秋》学家如啖助、赵匡、陆淳、孙复、刘敞、孙觉、程颐、苏辙、崔子方等的学说思想;又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对汉、宋《春秋》学的异同作出总结,对一些重要的问题形成结论性认识,并论析此时期内新《春秋》学的影响及其价值评判问题。本书希望能够较为全面地展现出唐代中叶至北宋末年《春秋》学的历史演变状况和新《春秋》学的内涵、主体风格及内部发展的多样性,进而为深入认识宋学的内涵、性质,以及汉、宋学的转型等重大学术史问题提供一个可靠的视点。

^① 见《中国文学报》第36册(1985年10月);译文见林庆彰、蒋秋华主编《啖助新春秋学派研究论集》,第399~453页。

^② 见《彦根论丛》第240号(1986年11月);译文见林庆彰、蒋秋华主编《啖助新春秋学派研究论集》,第455~490页。

^③ 见《彦根论丛》第246、247合并号(1987年1月);译文见林庆彰、蒋秋华主编《啖助新春秋学派研究论集》,第491~527页。



(一)本书的出发点和具体选作原因

汉学和宋学^①,作为我国古代学术思想史上前后相承的两个主要的儒学流派,近代以来学术界已从不同角度对其作出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大概说来,汉学研究者多从经学或史学角度出发,一方面继承清代乾嘉学派的学术传统;另一方面又汲取西学的方法,研究成果多有度越古人者,此以上世纪初的王国维、章太炎、刘师培等人为代表;宋学研究者多从哲学角度出发,借用西学的概念和研究方法,成就多集中在对以“程、朱、陆、王”学说为代表的宋明理学的研究上。

该派宋学研究队伍在20世纪初随着中国哲学门类的建立和研究的深入而逐渐壮大,传承绵延,在宋学研究领域内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从他们的研究角度、对象和方法来看,谓其研究理学则可,谓其所研究即等同于宋学则不可,正如邓广铭先生所指出:“理学是从宋学中衍生出来的一个支派,我们却不应该把理学等同于宋学。”^②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现今学术界仍多有将理学等同于

① “汉学”和“宋学”,在今天的语境中,既属于不同学术旨趣类型的范畴,又指我国古代学术思想史上前后相承的两大儒学流派。如周予同先生叙及“汉学”、“宋学”概念在清代出现时云:“清乾嘉学者自称‘汉学家’或‘朴学家’,将汉至清经学区分为汉学与宋学,《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初次划分为‘汉学’与‘宋学’[礼按:朱维铮先生注曰:“‘宋学’一词,初见明代唐枢《宋学商兑》(《木钟台全集》初集,清咸丰六年唐氏书院刊本)。唐氏‘宋学’,泛指宋朝文化,不专指经学。],说汉学是有根底的,不是浅陋;而宋学是精微的(也有人骂它空疏)。江藩撰有《国朝汉学师承记》和《国朝宋学渊源记》,其汉学与宋学之区分,来自四库馆臣的意见。清方东树撰有《汉学商兑》,是站在宋学立场上反对汉学的。陈澧撰有《东塾读书记》,想调和汉学与宋学,结果不成功。”(周予同:《中国经学史讲义》,见朱维铮编校《周予同经学史论》,第617页)四库馆臣所谓的“汉学”和“宋学”,基本上还是历史概念,尽管乾嘉学者“自称‘汉学家’或‘朴学家’”,已使其带有“学术旨趣类型”的成分;至江藩,其所谓的“汉学”和“宋学”,已多指两种不同的“学术旨趣类型”。本书所谓的“汉学”,是指在西汉时建立且一直流传至唐宋之际的儒家经学流派,其内部又分为经今、古文学两派;所谓的“宋学”,是指“萌兴于唐代后期而大盛于北宋建国以后”且一直流传至清代前期的新儒学流派。

② 邓广铭:《邓广铭治史丛稿·略谈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5页。余英时先生亦认为哲学史家关于“道体”的现代诠释,“就宋代儒学的全体而言,至少已经历了两度抽离的过程:首先是将道学从儒学中抽离出来,其次再将‘道体’从道学中抽离出来”(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8页)。另,邓广铭先生在该文中还认为:“出现在理学家们以前和以后,或与理学家们同时,而却都不属于理学家流派的一些宋代学者,也同样可以称作新儒家学派”,“如果把萌兴于唐代后期而大盛于北宋建国以后的那个新儒家学派称之为宋学,我认为是比较合适的”。可见,他是用较“理学家流派”宽泛得多的“新儒家学派”来定义“宋学”的,本书所谓的“宋学”亦本此义。又,邓先生于此是专就宋代“新儒家学派”而言“宋学”的,但众所周知,这个“萌兴于唐代后期而大盛于北宋建国以后”的新儒家学派直接影响、造就了此后直至清代前期儒学的基本风格。如皮锡瑞云:“若元人则株守宋儒之书,而于注疏所得甚浅。……明人又株守元人之书,于宋儒亦少研究。”(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3页)是谓此后儒学(经学)多递代相因。本书所谓的“宋学”的时段亦不拘限于宋代,而下延至清代前期。



宋学者。^①正因为一直拘执于这一认识，再加上近代以来汉学推尊者对宋学的轻视^②，从经学的角度出发，对宋明理学所依生的且实为宋学之主体的自唐中叶至清前期的经学进行系统的研究——这一方向和路数便一直不为近代以来学者们充分注意，研究成果几可屈指，虽然这确是全面认识宋学的必经之途。^③

① 如周予同先生云：“所谓‘濂’（周敦颐）、‘洛’（程颢、程颐）、‘关’（张载）、‘闽’（朱熹）四派，就是‘宋学’的主干。”（周予同：《关于中国经学史中的学派问题——中国经学史论之二》，见朱维铮编校《周予同经学史论》，第461页）再如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中国文化辞典》于“宋学”条解释云“主要指宋代的理学”；中华孔子学会编辑委员会组编、群众出版社1996年版《国学通览》第1069页记云“理学又称宋学”。

② 例如章太炎先生一生为学，较少涉足宋学，曾云：“宋儒治经以意推测的很多。南宋朱文公凭他底臆测酿成很多谬误。……元代，朱子学说大行，明代更甚。在这二代中，经学无足观。”（章太炎著、张昭军编：《章太炎讲国学》，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83～84页）其对宋明经学的轻视之意显而易见。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立自宋至明代经学为“经学变古时代”和“经学积衰时代”，可见其评价不高。吕思勉先生认为：“宋人讲《春秋》者，多近空谈；既未必得经之意，于史事亦鲜所裨益。非研究宋学者，可以不必措意。”（吕思勉：《经子解题》，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70～71页）周予同先生也曾认为：“大谈理气心性的宋学，显然不是研究经学的重点。”（周予同：《中国经学史讲义·经学的学派》，见朱维铮编校《周予同经学史论》，第596页）

③ 汉、宋学对举，主要是从经学上来讲的；学者分析两者间的差异，也主要是从经学的角度出发的。如漆侠先生曾指出：“以义理之学的宋学代替了汉学的章句之学，其主要的、基本的区别在于：汉儒治经，从章句训诂方面入手，亦即从细微处入手，达到通经的目的，而宋儒则摆脱了汉儒章句之学的束缚，从经的要旨、大义、义理之所在，亦即从宏观方面着眼，来理解经典的涵义，达到通经的目的。”（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载《文史哲》1995年第1期）但今人对宋学的研究，从经学角度入手者仍属少数。钱穆先生是较早从汉、宋学及清代经学的比较中认可宋学价值的少数现代学者之一，他认为宋代儒学“于孔子生平志业之重要性获得正确之衡定。学与教为先，而政治次之，著述乃其余事”（钱穆：《孔子传·序言》，三联书店2002年版）。林庆彰先生对明代经学的研究虽因注重发掘其朴学成分而带有为乾嘉学术溯源寻源头的意旨，但不可忽视的是，他的努力带动了一些学者对宋学研究的投入。余敦康、王铁先生的宋代《易》学研究，宋鼎宗、[日]斋木哲郎先生的宋代《春秋》学研究，[日]山根三芳先生的宋代《礼》学研究，董洪利先生的宋代《孟子》学研究，[美]Steven Van Zoeren先生的宋代《诗经》学研究等，皆是当今宋学研究领域内荦荦而显者。但总体来看，宋明经学的研究仍十分薄弱，远不能与汉学、清代经学研究相比。诚然，宋学的内涵极为丰富，远非传统经学的概念所能够涵盖，但笔者认为，从经学角度出发，实是将来宋学研究重要且急需的途径，尤其是在当今理学研究已相对充分的条件下。



宋学研究中的这种不平衡性,直接导致了人们对宋学基本性质认识的偏差^①,进而不能够对宋学(甚至汉学)的特点作出全面、准确的概括^②,且影响及对汉、宋学转型等重大学术史问题的深入探讨。^③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本书从经学的角度出发,将宋学中的新《春秋》学作为研究对象,力图以此来丰富宋学研究的路径和内容,扩充学术界对宋学内涵、性质的认识。又依据新《春秋》学发展的内在关联和朝代断限,将研究对象的时段限定在宋学发源至兴起的时代,即唐代中叶至北宋末年。

本书选择唐代中叶至北宋末年的新《春秋》学为研究对象的具体原因,可归结为以下四点:

1. 唐代中叶的新《春秋》学与宋学的起源密切相关,而宋学在北宋中期蓬勃振起,当时的新《春秋》学也与有力焉。近代以来学者论宋学的起源,有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说法。如陈寅恪先生云:

退之首先发见小戴记中大学一篇,阐明其说,抽象之心性与具体之政治社会组织可以融会无碍,即尽量谈心说性,兼能济世安民,虽相反而实相成,

① 邓广铭先生总结宋代的宋学特点云:“1. 都力求突破前代儒家们寻章摘句的学风,向义理的纵深处进行探索;2. 都怀有经世致用的要求。”(《邓广铭治史从稿·略谈宋学》)指出义理的深入探索和“经世致用的要求”并为宋学的两大基本特征。卢国龙先生进一步认为:“北宋儒学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政治哲学,它所代表的时代精神,是对文明秩序及其最高的体现形式——政治制度,进行理性的批判和重建。批判是追索文明秩序的合理性依据,所谓天道性命之理,即由此发畅;重建是探讨文明秩序、政治制度的合理模式,于是需要推阐‘王道’,作为最高的政治宪纲。”(卢国龙:《宋儒微言》,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是“把北宋儒学复兴的实质内涵归结为多元政治哲学的批判与重建”(余敦康先生评卢著语)。余英时先生亦指出:“‘上接孔、孟’和建立形上世界虽然重要,但在整个理学系统中却只能居于第二序(‘second order’)的位置,第一序的身份则非秩序重建莫属。”(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第183页)与这些认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前很多学者所谓的“宋学”往往即是指该时期内儒学家们的“心性之学或道德形上学”。按:卢国龙《宋儒微言》主要从北宋儒学家的文论疏议出发,从“北宋儒学复兴思潮与政治变革运动”相伴生的维度揭示了其所识知的北宋儒学复兴的实质内涵;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主要“通过概念辨析和历史追溯的交互作用”,以澄清“宋代道学(或理学)与‘治道’的内在联系”。这些皆与本书主张从经学的角度以探究宋学的实质内涵及其基本性质的出发点稍异,但它们因此同样彰显了当前学界对宋学(宋代儒学)基本性质认识的偏差,并从各自的角度对宋代儒学的政治文化内涵作出论析。

② 如今人常视“重义理”为宋学的最大特点,其实汉学又何尝不重义理?如汉代今文学家重视阐发经文中的“微言大义”,即使是古文经学,也往往附会谶纬、阴阳五行说等以作义说。刘师培《汉宋学术异同论》(见钱钟书、朱维铮编《刘师培辛亥前文选》,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08~428页)将两者的异同分为“汉宋义理学异同论”、“汉宋章句学异同论”、“汉宋象数学异同论”和“汉宋小学异同论”四个方面进行论析,揭出汉、宋学实不能简单地以“训诂”、“义理”为分判标志。刘氏此文对于汉、宋学的比较研究来说有着方法论的指导意义,更昭示出了当前宋学研究的薄弱之处。

③ 如陈来先生在论析近代以来“宋代道学之兴起,又是一个人人觉其重要,而致力不多的题目,且有说服力之著作亦少”的原因时,指出“非对理学之内在讨论有深入了解,决难辨察理学与佛道之真正关联”(见周晋《道学与佛教·序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即为其一。同样,非对宋学之实质内涵有精准、深入的认识,也绝难对汉、宋学的异同及其间的转承关系作出具有说服力的论断。



天竺为体，华夏为用，退之于此以奠定后来宋代新儒学之基础……又观退之寄卢仝诗，则知此种研究经学之方法亦由退之所称奖之同辈中人发其端，与前此经诗著述大意（异），而开启宋代新儒学家治经之途径者也。^①

范文澜先生云：

宋学的先驱为唐的傅奕（反佛）、吕才（反道）、陈子昂。……韩愈可以说是对这三人的思想的综合和继承。他提倡“文以载道”，反对佛老。韩愈不算经学家，但也讲点经学。他的《论语笔解》释“宰予昼寝”，说“昼寝”是“画寝”之误，“画寝”就是在寝室的壁上画上图像。当然，这个解释是不合古文派的观点的，但这却开了宋学的风气。与韩愈同时，有啖助讲《春秋》。……啖助讲《春秋》撇开传注，直接从经文中寻义理，这也是开宋学之风。^②

周予同先生云：

有人以为宋学萌芽于唐，那是指啖助、赵匡、陆淳。……陆淳三书为清儒所不齿，但他的书是“舍传求经”，不要三传，而直接研究《春秋》经中的微言大义。“舍传求经”是宋学的特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它开“宋人之先路”，是正确的。……我也主张宋学渊源于唐代的啖助、赵匡、陆淳。^③

三位先生的见解互有异同：陈氏推重韩愈，而其所谓“观退之寄卢仝诗，则知此种研究经学之方法”，是指卢仝“舍传求经”的《春秋》研究方法，认为它“开启宋代新儒学家治经之途径”；范氏明确认可“啖助讲《春秋》”也是开宋学之风；而周氏则将宋学的起源几乎全归于啖助、赵匡和陆淳。由此，唐中叶啖、赵、陆及卢仝等人的《春秋》学与宋学起源的关系之密切，已彰然可见。至于宋代新《春秋》学对于宋学兴起所作的推动、壮大之功，可以下述一点为证。

2.《春秋》为宋代第一大经，且当时的经解著作多有流传至今者。如牟润孙先生云：

统《宋史·艺文志》计之，宋人所著经部书，《春秋》类最多，居首位，《易》类次之。宋人著述固不能尽载于《宋史·艺文志》，而考之史传，证之典籍，谓宋人《春秋》之学最为发达，诚非夸大。^④

《宋史·艺文志》著录《春秋》类书籍 240 部，共计 2799 卷，其中绝大部分为宋人著作。朱彝尊《经义考》综合《宋史·艺文志》、《崇文总目》、《玉海》、《通志》等史志记载，著录两宋《春秋》学著作约 436 种。另据张尚英、舒大刚先生统计，“宋代

①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论韩愈》，三联书店 2001 年版，第 322～323 页。

② 范文澜：《经学讲演录》，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印《章太炎先生国学讲演录·附》，第 282～283 页。

③ 周予同：《中国经学史讲义》，见朱维铮编校《周予同经学史论》，第 618 页。

④ 牟润孙：《注史斋丛稿·两宋春秋学之主流》（增订本），中华书局 2009 年版，第 69 页。